

农民对农地的价值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社会养老保险、劳动力市场化视角

聂建亮^{1,2}, 钟涨宝²

(1.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基于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劳动力市场化与农地重要性的关系。结果表明: 虽然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高, 但是社会养老保险的完善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将会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消减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 从而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劳动力市场化可以消减农地的就业保障功能, 从而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而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又得益于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 因而人力资本也直接影响了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关键词: 农地; 价值认知; 社会养老保险; 劳动力市场化; 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7)02-0035-08

Farmers' value cognition for farmland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market transition of labor

NIE Jianliang^{1,2}, ZHONG Zhangbao²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farmer samples from 5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market transition of labor on the evaluation of farmland from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valuation level of farmland from farmers was still high although the perfection of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the process of market transition of labor would reduce the evaluation level of farmland. The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could reduce the endowment function of farmland and thereby reduce the level of evaluation of farmland. The market transition of labor could reduce the employment guarantee function of farmland and thereby reduce the level of evaluation of farmland,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market transition of labor benefited from the farmers'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s a result, the human capital also directly affected the evaluation of farmland from farmers.

Keywords: farmland; value cognition;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market transition of labor; human capital

一、问题的提出

农地制度一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农地承包经营权。而后, 为了鼓励农民对农地增加投资, 培养地力, 实行集约经营, 国家一再延长农地的承包期, 从“十五年不变”到“三十年不变”, 再到现在的“长久

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 延长农地承包期制度安排的负外部性逐渐显露, 如损害村落共同体成员农地占有的公平性, 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又制定基于农地流转的一系列政策。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地流转进行了详细规定。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地流转政策进行了完善。在农地集体所有、承包关系长期固化的状况下, 农地流转政策成为有效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安排^[1]。农地长期以来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

收稿日期: 2017-03-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SH007)

作者简介: 聂建亮(1985—), 男, 河北石家庄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料,是农民的命根子^[2]。费孝通就曾在《乡土中国》中深入剖析农民与农地的关系^[3]。洪名勇等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农地重要性评价的调查显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命题有96.45%的人认为完全正确,可见农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4]。农民对农地的价值认知必然对农地流转尤其是大规模流转造成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当前农地政策的实践。那么,当前农民对农地的价值认知如何?一般认为,农民对农地的价值认知是基于其保障功能的判断,那么农地的保障功能,尤其是养老保障和就业保障功能的消减对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目前很少有人关注,笔者拟基于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农地所承担的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功能,土地的固定性和保值增值功能成为农民最好的风险保障^[5]。农地的保障功能是多样的,而一般认为养老保障和就业保障功能是农地的核心保障功能^[6]。随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各项惠农政策在农村实施,制度性的养老保障建立并完善,消减了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稳定的非农就业基本实现,抽离了农地的就业承载功能。这些都使得农地原来具有的保障功能严重弱化^[7]。农地的养老保障与就业保障功能被消减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将降低。本文认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作为制度性的养老保障在农村普遍推行消减了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而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则消减了农地的就业保障功能。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提高农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进而影响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本身也将影响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 社会养老保险假设

在中国农村一直存在农民养老过分依赖土地,而国家和集体承担的责任过小^[8],制度性保障存在缺失的问题^[9]。2009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农保试点。新农保的实施解决了农村制度性保障存在缺失的问题,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养老担心,发挥了一定的养老保障效用^[10];其成功嵌入农村社会,并被农民接受,成为农村多元养老模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1]。所以,新农保的普遍推行使农民获得了制度性的养老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农地所承载的养老保障功能,进而降低了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由此提出假设1:新农保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消减的程度越高,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

新农保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消减程度如何测量呢?本文认为,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农民的参保状况可以在客观方面反映新农保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消减状况,而农民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认可度可以在主观方面反映新农保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消减状况。农民参加新农保后,其养老有了制度性保障,农地所承载的养老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减,因而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可能会降低;农民越认可新农保的养老保障能力,意味着新农保在农民当前或今后养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越大,新农保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消减的程度可能越高,因而农民对农地的重要性评价可能会越低。因此,根据假设1可以得出以下2个推论:相对于没有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更低(推论1);农民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认可度越高,其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推论2)。

2. 劳动力市场化假设

在传统农村社会,农地主要承载着就业保障功能^[12]。因此,如果农民就业不再局限于农地和农业,那么农地的就业保障功能便会被消减,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也会受到影响。近年来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农民就业方式发生了分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开始主要从事非农工作,他们或者外出务工经商或者在本地务工经商,使得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发展成为常态。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农地所承载的就业保障功能,自然也就降低了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基于此提出假设2: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对农地就业保障功能消减的程度越高,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

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比如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地区层面等,因为本文关注农

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所以选取较微观的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化进行分析。既然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农地所承载的就业保障功能,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那么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自然会对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根据假设 2 可以得出以下 2 个推论:个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推论 3);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推论 4)。

3. 人力资本假设

自 Schultz^[13]和 Becker^[14]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后,人力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中^[15]。很多学者关注到了农村的人力资本,并且研究比较集中在人力资本对农民劳动力流动^[16]、农民非农就业^[17-18]、非农收入^[19-23]等的影响。当然,也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还能通过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来为个人带来间接回报,因此不能忽略人力资本投资的间接回报^[24]。这些研究其实可以说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降低农民对农地的依附,实现就业的多元化以及收入的增长,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同时,人力资本还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市场化间接影响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基于此提出假设 3 和假设 4: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那么其自身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相应地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 模型构建

如果研究不同影响因素(自变量)对有序多分类变量(因变量)的效应,可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33]。本研究的因变量农地重要性评价是有序多分类变量,所以拟构建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P(y = y_i | X, \beta) = P(y = y_i | x_1, x_2, x_3, \dots, x_k) \quad (1)$$

在(1)中, y_i 有 1, 2, ..., 5 共 5 个选择。

在有序 Logistic 模型中,引入一个不可直接观测的潜在隐含变量 y^* ,在本研究中为农民对农地重

要性无法观测到的主观评价, y 为实际观测到的评价价值,调查数据中分别赋值为 1、2、3、4、5。 y^* 满足下式:

$$y^* = X\beta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X 为解释变量向量; β 为待估参数向量; ε 为独立分布的误差项。设 γ 代表本研究中农民对农地重要性评价结果未知的临界值分界点,即 $\gamma_1, \gamma_2, \gamma_3, \gamma_4$ 共 4 个分界点,潜变量 y_i^* 与实际观测值 y_i 的关系可由如下的对应关系来定义:

如果 $y_i^* < \gamma_1$, 即 $y = 1$; 如果 $\gamma_1 \leq y_i^* < \gamma_2$, 即 $y = 2$; 如果 $\gamma_2 \leq y_i^* < \gamma_3$, 即 $y = 3$; 如果 $\gamma_3 \leq y_i^* < \gamma_4$, 即 $y = 4$; 如果 $\gamma_4 \leq y_i^*$, 即 $y = 5$ 。

对于评价结果 y 各个取值的概率为随机误差项 ε 的累计分布函数对应值,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ed} \text{Prob}(y=1) &= \text{Prob}(X\beta + \varepsilon < \gamma_1) = \frac{1}{1 + e^{\gamma_1 + X\beta}} \\ \text{Prob}(y=2) &= \text{Prob}(\gamma_1 \leq X\beta + \varepsilon < \gamma_2) = \frac{1}{1 + e^{\gamma_2 + X\beta}} - \frac{1}{1 + e^{\gamma_1 + X\beta}} \\ \text{Prob}(y=3) &= \text{Prob}(\gamma_2 \leq X\beta + \varepsilon < \gamma_3) = \frac{1}{1 + e^{\gamma_3 + X\beta}} - \frac{1}{1 + e^{\gamma_2 + X\beta}} \\ \text{Prob}(y=4) &= \text{Prob}(\gamma_3 \leq X\beta + \varepsilon < \gamma_4) = \frac{1}{1 + e^{\gamma_4 + X\beta}} - \frac{1}{1 + e^{\gamma_3 + X\beta}} \\ \text{Prob}(y=5) &= \text{Prob}(\gamma_4 \leq X\beta + \varepsilon) = 1 - \frac{1}{1 + e^{\gamma_4 + X\beta}} \end{aligned}$$

2. 变量选取

农民对农地的价值认知即农地重要性评价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来自问卷中的题目“在您看来,土地对您的重要性程度有多高?”选项分别为“很重要”、“较重要”、“一般”、“不太重要”、“很不重要”,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分别赋值为 1、2、3、4、5。自变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社会养老保险变量。根据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从农民参保状况和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认可度两个方面来反映社会养老保险变量。农民参保状况分为已参保和未参保两种,为二分变量,分别赋值为 1 和 0。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认可度由新农保待遇满足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情况评价转化而来。新农保待遇满足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情况评价包括“完全不能满足”、“很难满足”、“基本能满足”、“完全能满足”,相应地转化为“认可度极低”、“认可度较低”、“认可度较高”、“认可度极高”,分别赋值 1、2、3、4。

(2) 劳动力市场化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测量存在不同的方式,顾海兵认为从事非农产业的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更高^[25],蔡立雄、何炼成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构成表征农村经济主体的市场化^[26],王晶则以农村社区当地非农就业比例来衡量农村市场化程度^[27]。可见劳动力的收入来源及非农就业是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基于此,本文用农民收入主要来源表征个体层面劳动力市场化状况,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分为务农和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为务农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低于非农,所以前者转化为“低度市场化”,赋值为0,后者转化为“高度市场化”,赋值为1;用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或者说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表征家庭层面劳动力市场化状况,用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占农户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表示,为连续变量。

(3)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一般来说包括教育、培训和健康等,而大量的研究其实是以教育水平来度量人力资本的^[28-31],甚至完全以教育资本来替代整个人力资本^[32]。借鉴已有研究的处理方式,用受教育水平表征农民的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为定序变量,赋值分别为:“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技校”=3,“大专及以上”=4。

(4)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将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家庭全年收入对数、家庭承包农地面积、所在地区设置为控制变量。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定义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地重要性评价	很不重要=1;不太重要=2;一般=3;较重要=4;很重要=5	4.515	0.834
自变量			
社会养老保险变量			
参保状况	已参保=1;未参保=0	0.776	0.417
对新农养老保障能力认可度	认可度极低=1;认可度较低=2;认可度较高=3;认可度极高=4	1.838	0.698
劳动力市场化变量			
个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高度市场化=1;低度市场化=0	0.341	0.474
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农户劳动力总数	0.391	0.352
人力资本变量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技校=3;大专及以上=4	1.779	0.782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女=0	0.612	0.487
年龄	连续变量(周岁)	47.868	12.783
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差=1;较差=2;一般=3;比较好=4;很好=5	3.557	1.130
家庭规模	连续变量(人)	4.664	1.943
家庭全年收入对数	连续变量	10.076	1.142
家庭承包农地面积	连续变量(公顷)	0.509	3.852
所在地区			
浙江温州	浙江温州=1;其他=0	0.106	0.308
山东武城	山东武城=1;其他=0	0.259	0.438
湖北广水	湖北广水=1;其他=0	0.193	0.395
江西寻乌	江西寻乌=1;其他=0	0.245	0.430
四川宜宾	四川宜宾=1;其他=0	0.197	0.398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研究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间先后对江西省寻乌县、四川省宜宾市、湖北省广水市、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武城县共计58个行政村(社区)1700名农民

的问卷调查,在收回的1661份有效问卷中,剔除非农户口问卷、没有承包或耕种农地的及变量缺失的问卷,最后获得1346份有效问卷。

在所选样本中,男性占多数,比例为61.2%,女性为38.8%;样本年龄集中在60周岁以下,其中18~40周岁的占26.9%,41~59周岁的占52.7%,

60 周岁及以上的占 20.4%；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及以下，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了 41.4%，初中的占 41.9%，高中/中专/技校的占 14.1%，大专及以上的占 2.6%；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以良好为主，其中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和比较差的分别占 3.1%和 16.3%，认为一般的占 28.1%，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分别占 25.8%和 26.7%。

调查发现，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很高。从表 2 可以看出，在总体样本中，认为农地“不太重要”和“很不重要”的样本分别占 3.5%和 0.4%，两者总计仅 3.9%；而认为农地“很重要”的比例高达 68.9%，认为农地“较重要”的占 18.1%，两者总计达 87.0%；认为农地“一般”重要的占 9.1%。不过，不同地区样本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存在一些差异，江西寻乌地区样本农民认为农地“很重要”的比例最高，达 88.4%，而其他地区样本农民认为农地“很重要”的比例均不到 70.0%，其中湖北广水地区比例最高，为 67.7%，四川宜宾地区比例最低，为 59.3%。如果综合农地“很重要”和“较重要”的样本，可以将调查地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江西寻乌，认为农地“很重要”和“较重要”，也就是说认为农地重要的比例高达 96.0%；第二个层次包括山东武城、湖北广水和四川宜宾，认为农地重要的比例在 85.0%左右；第三个层次为浙江温州，认为农地重要的比例为 77.6%。江西寻乌地区农民对农地之所以如此重视与当地的种植结构相关，江西寻乌是“中国脐橙之乡”、“中国蜜桔之乡”，主要以种植脐橙和柑橘为主，果农收益较高，所以当地的农地基本上全部种植了果树，柑橘种植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农民对农地的依赖程度最高。第二个层次地区的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农业收益不高，农村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不过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对农地的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也比较重视农地。处

表 2 农地重要性评价的描述统计 %

所在地区	很重要	较重要	一般	不太重要	很不重要
浙江温州	65.0	12.6	15.4	6.3	0.7
山东武城	60.1	24.4	9.5	5.2	0.9
湖北广水	67.7	18.8	10.4	2.7	0.4
江西寻乌	88.4	7.6	2.7	1.2	0.0
四川宜宾	59.3	25.1	11.8	3.4	0.4
总计	68.9	18.1	9.1	3.5	0.4

于第三层次的浙江温州，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农民收入来源于农业的较少，农地重要性程度相对较低。

五、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估计。根据研究需要，并展现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设计了 2 个模型对结果进行估计。模型 1 放入控制变量、社会养老保险变量及劳动力市场化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基础上增加了人力资本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影响农民对农地重要性评价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社会养老保险变量				
参保状况	-0.103	0.167	-0.105	0.167
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认可度	-0.210**	0.090	-0.220**	0.090
劳动力市场化变量				
个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0.680***	0.159	-0.649***	0.160
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0.604***	0.222	-0.621***	0.222
人力资本变量				
受教育水平			-0.182**	0.087
控制变量				
性别	-0.341**	0.137	-0.272*	0.141
年龄	0.021***	0.006	0.018***	0.006
身体健康状况	-0.030	0.064	-0.032	0.064
家庭规模	0.025	0.038	0.023	0.038
家庭全年收入对数	0.036	0.071	0.058	0.071
家庭承包农地面积	0.046	0.114	0.048	0.117
所在地区^a				
浙江温州	0.490*	0.251	0.510**	0.252
山东武城	-0.057	0.196	-0.022	0.198
湖北广水	0.369*	0.203	0.384*	0.203
江西寻乌	1.503***	0.252	1.525***	0.252
阈值=1	-5.113***	0.907	-5.352***	0.915
阈值=2	-2.771***	0.802	-3.013***	0.811
阈值=3	-1.370*	0.793	-1.610**	0.802
阈值=4	-0.133	0.792	-0.367	0.800
-2 倍对数似然值	2 163.937***		2 159.535***	
Nagelkerke R ²	0.156		0.159	

注：a.参照为四川宜宾；***、**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1. 控制变量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模型 1 显示，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所在地区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身体健康状况、家

庭规模、家庭全年收入对数、家庭承包农地面积等变量则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性别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即相对于女性农民,男性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更低。这应该与当前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相关^[33],女性对农地的依赖程度更高,与农地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更高。年龄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即年龄越大,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高。可能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并更可能从事非农工作,所以对农地的依赖较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从事非农工作的可能性降低,而对农地的依赖增加,从而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更高。所在地区变量对农民农地重要性评价的影响表现为,相对于四川宜宾的农民,浙江温州、湖北广水、江西寻乌的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更高,这与表2中选择“很重要”项的结果基本一致。在放入人力资本变量的模型2中,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所在地区等变量仍然显著,而其他的控制变量仍然不显著。不过性别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明显降低,说明文化程度变量消减了性别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也即性别对农民农地重要性评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性别农民的文化程度不同所致,统计结果也显示男性农民的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女性农民。

2. 社会养老保险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模型1的结果显示,参保状况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过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认可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虽然参保状况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过参保状况变量系数的方向为负,说明参加新农保的农民对农地重要性更趋向于较低的评价,这一结果对推论1有一定的证明。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认可度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即农民越是认可新农保的养老保障能力,那么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就越低。因此,推论2得到了证明。新农保是为解决当前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普惠性的农村社会经济政策,可以预见随着新农保的逐渐推进和制度的逐渐完善,新农保的养老保障能力也会逐步提高,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被新农保消减的程度会更高,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模型2与模型1相比,参保状

况变量、对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认可度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几乎没有变化,说明结果比较稳健。

3. 劳动力市场化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模型1显示,农民个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即相对于劳动力低度市场化的农民,劳动力高度市场化的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更低。这反映了个体层面劳动力市场化对农地重要性评价的影响,农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农地的就业保障功能被消减的程度越高,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也就越低。因此,推论3得到了证明。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即农民所在家庭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也就是说农民所在家庭中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的比例越高,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农村中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家庭中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比例越高,即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则农民所在家庭农地的就业功能被消减得越多,那么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因此,推论4得到了证明。综合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劳动力市场化的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市场化降低了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假设2得到了证明。

4. 人力资本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

表3显示,当加入人力资本变量后,模型2的-2倍对数似然值有所降低,Nagelkerke R^2 值相对于模型1有所提高,意味着模型2的拟合优度和解释力优于模型1。模型2显示,受教育水平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农地重要性评价,也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其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其他生存技能欠缺,眼界也较狭窄,但是当前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农民的就业途径得到了扩展,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也更有可能会离开农地,从事其他非农工作,因此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普遍较低。假设3得到了证明。

另外,在增加了人力资本变量后的模型2中,劳动力市场化变量的系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变量的显著性程度未变。其中,个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变量的系数的绝对值有所降低,也即个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被人力资本变量

消减。因为人力资本的增加,尤其是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提升农民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统计结果即显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与其个体劳动力市场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模型 2 中,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变量的系数略微增加,主要是因为家庭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与个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应该说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靠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农民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因而人力资本变量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劳动力市场化变量的解释力。因此,假设 4 得到了证明。

六、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农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当前农地政策,尤其是农地流转政策在农村的实践,因此,本文基于对中国 5 省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劳动力市场化与农地重要性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虽然农民认为农地的重要性程度很高,但是社会养老保险的完善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将会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第二,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消减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从而降低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农民越是认可新农保的养老保障能力,那么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第三,劳动力市场化消减了农地的就业保障功能,从而影响了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而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又得益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第四,人力资本直接影响了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越低。

近年来国家一直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同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可见规模经营已成为当前国家农业经营政策的主导方向。规模经营实现的前提便是有序的农地流转,这就需要农民让渡农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农地保障功能的存在使农地重要性凸显,进而不利于当前农地政策尤

其是农地流转政策在农村的实践。因此,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随着农地的保障功能尤其是养老保障和就业保障功能分别被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劳动力市场化消减,农民对农地重要性的评价会逐渐降低,“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观念也将逐渐弱化,而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等农地政策在农村实践的空间将增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弱化农地的保障功能,降低农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促进农地政策在农村的实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增强制度性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能力。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将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来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农保的区别不大。因此,需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能力,一方面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加财政的补贴力度,提高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提高对农民个人账户的补贴比例,另一方面需要鼓励农民尽早参保和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参保。第二,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要提高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农民子女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另外,要加强直接面向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非农就业能力,为农民选择不同的就业途径提供技术保障;同时鼓励发展乡村企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参考文献:

- [1] 聂建亮,钟涨宝.土地流转的策略选择与资源动用——基于对云南省 W 村的个案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01-107.
- [2] 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4] 洪名勇,施国庆.欠发达地区农地重要性与农地产权:农民的认知——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5):35-43.
- [5] 程佳,孔祥斌,李靖,等.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流转关系研究——基于京冀平原区 330 个农户调查[J].资源科学,2014(1):17-25.

- [6] 韩芳.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7] 马流辉.农地福利化:实践机制、后果呈现及其优化路径——以沪郊埭村为个案的初步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66-73.
- [8] 高和荣.社会转型与健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3(5):56-60.
- [9] Shen Ce, Williamson J B, Williamson. Does a universal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cheme make sense for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 2006, (2): 143-153.
- [10] 聂建亮,钟涨宝.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的可持续研究——基于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14(3):70-79.
- [11] 聂建亮,钟涨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进的基层路径——基于嵌入性视角[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03-110.
- [12] 聂建亮,钟涨宝.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农地转出的响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03-111.
- [13] Schultz, T.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 1-17.
- [14] Becker, G. Human Capital. 2nd edi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5] 李海峥,梁赞玲, Barbara Fraumeni, 等.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经济研究,2010(8):42-54.
- [16] 谢正勤,钟甫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基于江苏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8):28-32.
- [17] Brauw A, Rozelle S.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12(1): 57-71.
- [18] 陈玉宇,邢春冰.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J].经济研究,2004(8):105-116.
- [19] 任国强.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的考察[J].南开经济研究,2004(3):3-10.
- [20] Zhang H, Zhang L, Luo R, et al. Does education still pay off in rural China: Revisit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wage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8, 16(2): 50-65.
- [21] 邹薇,张芬.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J].中国社会科学,2006(2):67-79.
- [22] 张艳华,李秉龙.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6(6):9-16.
- [23] 李宪印,陈万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5):54-99.
- [24] 黄斌,徐彩群.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J].中国农村经济,2013(1):67-75.
- [25] 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53-56.
- [26] 蔡立雄,何炼成.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的相对进程研究[J].经济学家,2008(2):18-25.
- [27] 王晶.农村市场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3(3):119-144.
- [28]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62-68.
- [29] 胡鞍钢.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J].中国人口科学,2002(5):3-12.
- [30] 姚先国,张海峰.教育、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8(5):47-57.
- [31] 岳书敬,刘朝明.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经济研究,2006(4):90-96.
- [32] 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5):10-18.
- [33] 薛薇.SPSS 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 [34] 狄金华,钟涨宝.土地流转中农村女性权益状况的实证分析——以河北省米村和湖北省石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2(3):18-25.

责任编辑:曾凡盛